

密尔的自由思想述评

吴新星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密尔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继承了霍布斯、洛克等人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至上的思想,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个人至上的自由观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与国家的尖锐对立。在此基础上,他将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了成功的结合,他认为,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府必须要实施有限而必要的干预。这样既实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过渡,也使得古典自由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个人自由;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有限干预

中图分类号:B5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1-0069-04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下简称密尔)是西方自由主义学派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自由思想发展的贡献,甚至被视作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密尔并未建立一套崭新的思想体系,而是糅合了功利主义等多种学说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改造。自由主义在密尔这里实现了繁荣,但是就在密尔塑造的繁荣背后,自由主义也遭遇了无法突破的困境。本文将逐一述评之。

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

自由主义作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应该是在近现代完成的。但也有学者主张从历史的深处对自由主义进行考察,例如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就将自由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生活。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一书中,将自由主义的传统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公民生活,并以此为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建立一条横贯古今的思想路线。笔者认为,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对历史的追溯源于其将自由视作

法律下的自由的理解。他从法治的角度对西方的法治传统进行追溯,试图探索现代自由观为何要在法律下实现个人自由,而不是其他条件下的缘由的探索。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共生活强调的是政治权利,“个人在公共生活中永远是主权者,但是在个人关系上却都是奴隶”^[1]。而自由主义更多强调的是个人自由,追求法律制度下个人的独立,而非“古代人的自由”。从17世纪开始,个人自由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的等价物甚至先于社会来加以探讨。尽管我们能够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找到自由的成分,但“这些成分仅仅构成自由主义史前的内容,而不是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2]。所以,应当把自由主义视作一种现代现象,它的确立是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这一时期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建立了特殊的天赋人权、自然法则、社会契约理论,这标志着自由主义开始以一种思想体系的面貌呈现。当然,当时还没有“自由主义”这一说法,关于“自由主义”概念的提出应该是在19世纪初期。

霍布斯从权利的角度阐释自由的讨论方式是典型的英国古典方式。具有创造性的是,霍布斯并未

从历史中寻找自由的根源,而是从对自然状态的摆脱来定义自由。霍布斯主张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认的意义来说,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3]。问题在于,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霍布斯更多地倾向于国家权力,留给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由于约束国家权力的自然法则过于脆弱,霍布斯的设计在现实中往往会导致政治专制,个人自由不过是一纸空文。

斯宾诺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霍布斯的理论缺陷。他强调政治的真正目的就在于自由,个人有权利听从自己理性的指导,打破外在的强制,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斯宾诺莎只承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反对个人行为的自由,这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一直到洛克,自由主义才成为全面而系统的政治理论。

洛克认为个人享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自然权利构成了政府权力干涉个人的最低限度,每个人天然平等地享有自由,而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洛克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国家和政府之上,也因此被尊为“自由主义之父”。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价值的对立,却没有能够实现个人与社会的价值统一。

洛克之后,卢梭也揭示了天赋的个人自由与现实的不自由之间的深层矛盾:“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卢梭尝试在“公意”的前提下对个人自由和社会价值进行统一。他认为,自由与被统治在实质上并不冲突,要实现个人自由必然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建立。按照他的契约论,个人经过同意后组成社会,主权者以“公意”对个人进行统治,个人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的“同意”,所以“公意即自由”。卢梭追求的是古希腊城邦式的“理想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着自主理性,享有“积极的自由”。卢梭为人类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图景,但如同贡斯当对其的批评:“他宣布主权不能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宣布它不可能被行使”。就算行使了,“公意”的执行者必然是一个或少数的主权者。“因此,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抽象的人,相反,他是让自己服从于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事的人。”^[1]“公意”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在现实一经实践,“个别意识”假借“公意”之名行专制之实。这种理论内在的冲突性使得卢梭的人民主权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甚至导向专制。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基于自

然法学说,强调个人天赋的权利,关注社会中的个人价值。除了卢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几乎都是以防止侵害原则为特征的消极自由。密尔的自由观宣扬国家不干涉条件下的个人自由,同样也是基于防止侵害为原则的。他认为“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使用的群体的权利,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5]

为此,密尔将个人的行为分为2类:一类是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另一类是直接危害他人的利益,只有发生这样的行为,个人才应当受到法律和舆论的制裁。所以,密尔认为只要个人的行为不妨碍他人,就应当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在社会中,一个人所做的对自己的祸害,同样也会通过与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而严重影响他们,并部分间接影响社会。当个人“由于这种行为而背弃了他对一个人或多数他人的明确而可指定的义务时,这事情就被划在只关己身的那一类事情之外,而应当在道德的不谅面前接受质问”^[5]。但是这种质问的惩罚点在于他背弃义务的行为后果,而不在于他原先活动的本身。

对于为何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如此严格的限制,密尔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一些事情由个人来办比由政府来办效果可能更好,因为在个人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比他了解他自己;第二,一些事情虽然由个人办理的效果并不一定比政府办理的效果好,但是仍然适宜由个人办理,这样作为一种对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以此来激发个人的主动,才能提高判断能力;第三,过度依赖政府权力会造成政府权力的膨胀,庞大的政府权力使得整个社会过分依赖官僚系统,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涌进这个机构,长久下去,社会与国家便成为同一体,个人的自由也就消失殆尽。所以密尔从个人的自由必须得到充分尊重的角度出发,主张自由放任的原则,将政府的干预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生活中的事务最好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们自己来解决,因为“社会在个人只关己身的事情上要强使他一反其自己的判断和目的,这种干涉只能是以一般的臆断为根据;可是这种一般臆断可能完全错误”,毕竟“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5]。

总体上,关于个人自由的领域,密尔将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限定在消极防止危害他人的行动上。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意识的内向境地,尤其

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密尔坚持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人类前进和幸福的必然前提,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必要基础,是一条普遍的社会准则。因为社会所暂时承认的真理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假如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人类便失去了一次改错前进的机会。“真理的优越性应当在于虽多经磨难和迫害,但仍不折不挠,知道某次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5] 所以对于思想和意见是不能进行压制的,只有充分的表达才能够防范社会暴虐。压制思想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它是对现存的一代和后代的可耻掠夺。二是趣味和旨趣的自由,即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不伤害他人的利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人类倘若一直受制于传统、习俗或他人的行为准则,那么就缺乏进步的动力。“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力、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5]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文化的不断创新,在于个人丰富的首创性。而首创性的获得就在于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旨趣来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否则人类的生活就会毫无生机。三是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即正当的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个人可以为了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自由联合。只要参与人能够自主活动,并且不妨碍他人,这种自由就是正当合法的。一个社会倘若这样的权利得不到尊重,那根本算不得一个自由的社会。其实,严格说来这种强调个人联合的自由并非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个人独立的追求几乎到了癫狂的地步。他们对任何党派、团体、社群意志对个人自由的危害可能保持极度恐惧。杰斐逊甚至认为,美国可以在每一个世代进行一场革命来反对团体、党派或社群的势力增长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但是政治多元化在密尔生活的 19 世纪已经成为了较为成功的现实实践,秩序与自由并未发生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激烈冲突。

二、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造

在密尔生活的时代,西方社会的状况已经大大不同于洛克生活的年代。19 世纪的英国可以说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所支配,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是我们往往也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过分简化了。至少在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政府的干预就逐渐向诸多的生活领域拓展,而且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或古

典自由主义的告诫从未完全畅通无阻。“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次破裂很可能是由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边沁及其门徒詹姆斯·密尔导致的。”^[6]

古典自由主义将自由建立在虚无的自然法基础上,以纯粹道德基础为根基,这样就造成了个人与国家尖锐对立。和以往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密尔对此进行了改造,将过去局限于个人与国家的自由扩展到社会领域,使得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有了结合的可能。密尔在《论自由》的开篇开宗明义地说:“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限制和限度。”^[5] 同时,他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主张,政府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幸福”使得这种延伸成为可能。在他看来,个人自始至终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同时,个人自由的发展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样不能有损于社会价值,个人道德仅次于社会道德。他通过确定“群己权界”的原则,维护个人的自由,同时又对个人的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以维护社会利益。密尔通过一种折衷的方式实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的调和,在独善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生活“兼善”的二元平衡。

如密尔所言“在一切道德原则上,我总是诉诸于功利的”^[5],其自由观的哲学基础是他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由边沁创立,到密尔这里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密尔反对功利学说只注重物质利益而不注重精神追求的观点,改变了边沁重视快乐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的缺点。他认为那样会造成情感的萎缩和内在精神的缺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本身首先应当追求精神快乐。密尔认为高级快乐的产生与人较高等的官能相联系,而高等官能的获得正是在于个性的发展。个性的发展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这一观点成为联系密尔功利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桥梁。而个性的发展需要自由和境遇的多样化。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天然秉性是希望将自认为好的观念强加于他人,因而为了实现个性的多样性,必须保证每个人具有独立作出选择的绝对权利。个人自由之必要得到了彰显,而且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保证个性不被压制。

密尔还强调,为了伟大的善,还是需要社会对个人的有限干预。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不是行动者自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所以功利主义的道德

标准承认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作出自我牺牲是善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爱邻如己”这两大原则构成理想功利主义的道德圆满状态,也正是密尔将自由扩展到社会领域的体现。基于这样的原则,密尔非常反感当时作为“守夜人”的政府的无作为,认为它只具有消极的工具性价值和职能。充当“守夜人”的政府把职能仅仅定位在保证个人自由、安全和财产的不受侵犯,而对社会整体的价值保持冷漠和怀疑。他认为政府应当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保证个体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的实现。政府应当使谋生手段对每个个人都很容易,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希望改变自己和后代的状况,发展人类的理性和道德水准。自由放任原则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一是不适应不具有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二是不能自然而有效地实施一些人们对自身利益做出的最好判断;三是不能自然地实行利他行为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须的。

密尔认为放任原则应该作为基本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施并非没有限制,这个界限就是有限的社会干预,发挥政府的积极功能。密尔之所以积极推崇个人自由,又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原因在于他认为如果在社会的发展中,个人在自身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又能够不损及他人,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在文明社会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幸福,而且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幸福和进步。他反对边沁那种个人主义的“个人最大幸福”,倾向于认为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应以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为前提。个人的幸福并非个人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个人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的幸福。因此,任何有利于产生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行为都是正当的。

当然干预并不能否弃密尔更为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密尔强调,政府干预必须要有节制,否则必然伤害到个人的自由。政府有限干预必须根源于这样的原则:一方面是有利于社会利益的事,个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另一方面是有利于社会的事,个人由于没有报酬而不愿做。具体说来,政府干预的主要范围包括:强迫教育、保护妇女和儿童、干预垄断、维护社会利益以及公共救济等。政府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公民偶然偏好的那种快乐,关键在于培养和教育公民能够自由地追求高尚的快乐。由此可见,密尔的自由主义虽然仍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但是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利己主义,他主张社会的整体福利是衡量个人的标准,并且认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真正的内在价值与合理性。

密尔的节制精神不仅表现在对政府的限制,更在于改变了一贯盲目追逐个人自由的主张,实现了个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美好结合。密尔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内在价值、个性的自由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在新旧自由主义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当代新自由主义,甚至新保守主义者,都能从密尔的思想中各取所需。

三、结 语

密尔的自由观是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关键点,并在这一转折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而言,密尔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思想大师。

密尔的政治哲学更加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功利主义。密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改造了传统自由主义,将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拓展为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在他那里,自由有了新的内涵,并试图为自由设立界限,他赋予自由更多的实践意义,给自由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他改造了边沁的功利主义,赋予个人的最大幸福以精神内涵。密尔强调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得到同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正如李强在《自由主义》中所指出的:“他把功利的原则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成功地融为一体,从而使得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有了相当牢固的亲缘关系。在密尔之后,任何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评功利主义的人都不得不考虑密尔的特殊贡献。”

但是密尔依然摆脱不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他对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谓“群己权界论”依然是从政治原则出发做出的一种抽象和虚幻的划分。另外,他对人性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强调个性的绝对性,强调大众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性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甚至还寄希望于基于人性缺失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政府能够为了发展个性的发展而做出努力。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因为政府有了所谓实现公众福利的盾牌,目的说明手段正确的伎俩使得政府给个人带来的伤害已经足够多,“伟大的善”无非变成了“伟大的善意谎言”。

(下转第 89 页)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磨灭密尔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贡献。正是由于他,自由主义从早期的个人主义特征逐渐变为“独善”与“兼善”的统一。自由并非多元价值中的某种特殊价值,而是实现多元价值共存的基础。密尔自由观的伟大之处在于向人们揭示了任何缺乏多种思考和生活模式的社会都不是适合自由人的理想社会。自由就是一种多样的、可以改变的思考和生活模式。

参考文献:

[1] 邦雅曼·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Review on Mill's

WU Xin-xing

-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John Stuart Mill is an important theorist in the western history. He inherited the personal freedom theory developed by Hobbes and Locke. But Mill realized that the extreme individualism would lead to the sharp opposi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Based on these, Mill integrated the utilitarianism and liberalism. He thought the government must do some limited and obligatory intervention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s greatest happiness. These changes could realize the transition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to the neoliberalism, and gave classical liberalism with vitality.

Key words: personal freedom; classical liberalism; utilitarianism; limited intervention